



中国万花筒

(日) 松本盛雄 著
田建国 董 燕 译



辽海传播出版社

中国万花筒

松本盛雄 著

田建国 董 燕 译

田建华 校

辽海传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万花筒 / (日) 松本盛雄著; 田建国, 董燕译.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6.8

ISBN 7-5085-0953-6

I. 中...

II. ①松... ②田... ③董...

III. 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0427 号

中国万花筒

著 者: (日) 松本盛雄

译 者: 田建国 董 燕

图片供稿: 松本盛雄 中国图片库 国新图库 五洲传播出版社

责任编辑: 高 磊

装帧设计: 田 林

设计制作: 北京尚捷时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五洲传播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莲花池东路北小马厂 6 号 邮编: 100038)

电 话: 8610-58891281 (发行部)

网 址: www.cicc.org.cn

承 印 者: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20 × 965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85 千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5-0953-6/I · 87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序：味道新奇的中国论（国分良成）	7
中文版自序	8
第一章 我所遇到的领导人	11
一、方言与口译	12
二、电影《邓小平》	14
三、改革的主角朱镕基	17
四、“女强人”吴仪副总理	19
五、前外交部长钱其琛的《外交十记》	22
六、难为译员的谚语	24
七、东北振兴与辽宁省长薄熙来	27
八、加入 WTO 与中国	29
第二章 现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	33
一、煤矿事故与“为人民服务”	34
二、电视剧《刘老根》	36
三、爆竹与春联	38
四、月饼杂感	40
五、北京的四合院	42
六、国家大剧院是“中体西用”吗？	45
七、中国首次载人航天	48
八、劣质奶粉案	50
九、满汉全席	53
十、绿色食品	56

第三章 探访中国各地	59
一、平遥古城	60
二、中国革命的圣地	62
三、是美酒还是假酒?	65
四、九寨沟——迷失的秘境	67
五、丽江的东巴文字	70
六、荔枝的故乡	73
七、广东从化温泉	75
八、黄山的牌坊群	78
九、厦门——听涛鼓浪屿	81
十、青岛国际啤酒节	83
十一、泰山	86
十二、哈尔滨的冰雪节	89
十三、敦煌·莫高窟	91
十四、吐鲁番的交河古城	94
十五、新疆多种多样的少数民族	96
第四章 多彩中国	101
一、五彩缤纷	102
二、徐福东渡	104
三、感谢与道歉	106
四、问路	108
五、《三国演义》与对华投资	110
六、历史上的恶宰相——秦桧	112
第五章 自豪的文化人	117
一、爱国画家黄胄先生	118
二、长城音乐会	120
三、中国琵琶名手杨静	123
四、王先生的民俗博物馆	125
五、篆刻家封友文先生	127

六、男子十二乐坊	130
第六章 日中友好的热情	133
一、热河古迹	134
二、国际茶道丹月流	137
三、舞剧《大敦煌》	140
四、在青海省建小学的人	142
五、百年树人	144
六、保护朱鹮	147
第七章 在中国工作	151
一、人民大会堂	152
二、钓鱼台国宾馆	154
三、活化石菇——“肉灵芝”	156
四、西藏与诸神之神山	159
五、苏州新区：积极引进外资	162
第八章 解读中国经济	167
一、如何解读中国的 GDP 统计	168
二、外汇兑换券与人民币汇率	171
三、中国的能源靠得住吗？	173
四、收入差距的现实	177
五、黄河断流	179
六、山西省的污染治理	181
七、垃圾处理问题与商业机会	184
八、世纪工程——三峡大坝	186
九、烂尾楼与房地产泡沫	188
十、ASEAN 和 FTA 的构想——来自最前线的期望与现实	191
译者跋	194

序：味道新奇的中国论

与松本先生交往正好20年了吧。我记得，当时我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客座研究员，松本先生来视察，我们见的第一面。后来他也一样当客座研究员，在密歇根大学逗留了一年。遗憾的是我却回了国，与他错过了。不过从那时起，我便不断收到他写的近况报告的拷贝信件。

信件总是以一两个月一次的频率定期送到，上边的名称也随着他的工作调动而变化。起初叫“密歇根来信”，紧接着又叫“纽约通信”，而从中国发来的就叫“人民月报”。从那以来，这拷贝信件就一次不落地定期发来，真让我万分佩服。

就是这位松本先生，后来从香港发来的信件叫做“山庄来信”。里面的当地信息总是渗透着他独特的感悟。听说他用这个方法在周刊杂志上发表了系列随笔，想必这耗时一年半的结果就是这本书了。

松本先生操一口比某些中国人还好的汉语，在外交第一线与中国打交道近30年。我原以为他会写点什么外交秘话之类的，结果根本不是，而是些聊天闲话，就像书名一样——《中国万花筒》！然而，只要你读进字里行间，松本先生的体验和在那背后做支撑的味道新奇的中国论就会跃然纸上。

这是一本清新的书。我很愿意请已经有点听倦了充斥于街头巷尾的中国论的人们开卷一读。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分良成

中文版自序

我和中国交往已有 35 年。

自 1971 年在东京外国语大学开始学汉语起，到 1976 年进入日本外务省乃为初期阶段。后来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进修两年回国，还是在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主管中日经贸业务，同时兼任首脑翻译工作 16 年之久，是为发展阶段。自 2001 年到最近，分别在北京和香港使领馆担任领事部、经济部和文化交流部部长，则为成熟期。

在这过程中，我亲身接触了对中日关系和中国自身的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如日本政府开始提供对华贷款、两国签定投资保护协定、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等。

回想这些经验，我深深感到，中日两国合作关系日益发展，双方的相互了解随之加深。

本书所收之随笔原本是为了一本在香港出版的日文杂志而写的。我连续写到 70 多篇的时候，由于该杂志停刊而不再写下去了。但综观自己所写作的东西，我也觉得有一定意义。于是接受该杂志的邀请，编为一书，取名“中国万花筒”，由日本田畑书店出版。后经友人推荐，由北京的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中文版。

有些日本的专家称自己已经走遍了中国各地，处处都很了解，无所不知云云。我却觉得如此说法真是荒唐之极。毋庸讳言，每一个中国人长得都不一样，正如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曾经说的：“要是每个人都长得一样儿，照相馆就没活儿干了。”何况这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啊！

此书名为《中国万花筒》，是因为我对中国了解还是不够深，所以到处看到的是前所未知的事情。

我喜欢旅游，在中国走了不少地方。但每一次去旅游都有新鲜的感觉和不少意外的收获。有一次在某一个少数民族的小村庄看到一位老妇人坐在门前的石阶上，我就走到她的身旁搭了几句话。虽然是一个外地人，但她的亲切笑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中，往往有不少有志气的人士在没有人注意到的情况下默默地努力。我接触过的一些文人都是如此。我在书中介绍的这些人大概是其中的极小一部分。而且我所知道的他们的功绩也很有限。但我相信，正是有了他们的不懈努力，我们的广泛往来才得以支撑。

我在书中描写的基本上都是自己的经验，因此自然也不能代表一般人的观点。我也不愿意记录那些直接关系到工作的内容。有些朋友还劝我说：你一定要披露一些内部情况，比如首脑会谈上的议论等，这样肯定会受读者欢迎。但我也没有采纳这些人的建议。

我只希望通过这些平平凡凡的随笔，让更多的日本人对中国以及

当中日关系作出卓越的贡献上更加深理解。希望更有知识的读者，经

第一章 我所遇到的领导人



一、方言与口译

很早的事情了，离今天已经有30年。那时我在大学学习汉语，打过好几回口译的工。说是口译，其实所译的东西离我的本职很远，我做得也很拙劣，但却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有一次，来了一个中国团组到化工厂研修，要住厂三个多月，我便去照顾他们，还兼做翻译。他们是为安装和维修上海金山石化总厂乙烯生产设备来学习有关技术的。我负责照顾的是王、蒋、吴三位先生。他们都是上海人。小蒋年轻些，会讲普通话。可年纪大点的老吴口音太重，说的很多都是技术用语，真叫我一筹莫展。口译时因为方言而卡壳的遭遇，这是头一回。

不过，当时被派到日本来的中国技术人员的干劲感动了我。那劲头，与其说是受社会主义体制所迫，倒不如说更像是他们自己想掌握好技术来为国家作贡献的纯真而自豪的心气所致。

一天，研修高压管道特殊焊接技术的吴先生反映说手臂剧痛。细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每天晚上他都要操着笨重的焊接机械把白天的作业实际复习一遍，而他那年已经快60岁了！

后来我进了外务省（外交部），干上了专业口译，与要人接触的机会很多，无数次地被方言和口音弄得瞠目结舌。

1980年1月，当时的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访问日本。他是江苏常熟市人。我曾在上海复旦大学进修过语言，上海离常熟又比较近，可我还是根本听不懂他的话。如果光是方言和口音倒还好，可他说话又快，声音还小，就是中方译员也得凑近，都快把耳朵贴到了他的嘴上

才能听清，很是辛苦。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华国锋出任总理兼军委主席。1980年5月他来日本访问。在从羽田机场到迎宾馆的防弹车里，他直接跟坐在折叠座上当翻译的我打招呼，问我说：“你在哪儿学的汉语？”让我感到了中国领导人对下边人的关怀。他是山西交城人。巧的是，我在复旦大学进修的时候，同寝室的中国同学阎君就是华总理的同乡，所以已经听惯了他们的口音。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华总理称呼当时的大平正芳首相时所用的方言——“太平总理大臣”。访日后不久，他就把总理之位让给了河南人赵紫阳。

赵总理的话比较好懂。他1982年5月正式访问日本之前，我已经几次机会在北京见到他，后来也经常会在会见等场合与他同座。感觉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一言一语越来越容易听懂了。我闹不清，这究竟是因为总理职位的必备技巧，还是我的理解能力提高了。

对译员来说，口音和方言很难对付。不过，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得出的结论是，带口音的普通话也好，方言也好，都无所谓。听上去这个结论好像有点不负责任。

曾几何时，在上海观赏因绍兴酒而闻名的浙江东部的地方剧——越剧时，坐在后边座上的中国北方人向我打听台词的意思，问道：“刚才说啥来着？”原来连中国人自己都听不懂哦！话虽这么说，在实际的口译场合，真的碰到了方言，那可就是坐也坐不住、搞也搞不清，还不能不说话，这真是得流着冷汗应付的差使。

日中双方虽然都使用相同的汉字，但读音却不同，所以日本人的姓名经常给人带来麻烦。如果再加上地方口音，就更难弄了。

1977年8月，陕西省生人的驻日大使符浩先生跟日本朋友谈到了许多“老朋友”的话题。我现在已经记不大准了，大概是因为“矶崎”的“矶”这个汉字想不起来大费了一番周折。我还把“市村”和“西村”、“渡边”和“渡部”、“加藤”和“嘉藤”等许多相似的名字混为一谈。因为谈话中提到的尽是我实际上没有见过的人，所以我一边翻译，一边担惊受怕，苦不堪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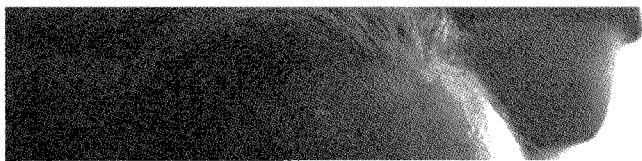
二、电影《邓小平》

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题材的电影《邓小平》已经在中国全境公映。据导演丁荫楠介绍，光是剧本就花了九年，写了五十几稿，反复研究，先后采访过的有关人员超过一百人。

电影从1976年那激荡的政治形势下，邓小平和叶剑英在北京西山中央军委的一幢房子里共同决策改革开放的场面开始。

1976年对中国来说是巨变的一年。我在这一年进入外务省，被分配到当时的亚洲局中国课当实习生，经历了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等中国革命领导人相继去世的过程。在唐山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地震后，我还参与了解受灾情况、援救中国人和常驻中国的日本人等繁重的工作。

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是，89岁的邓小平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人的陪同下站在杨浦大桥上，一边眺望脚下的景色，一边提出希望，说要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浦东开发区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摩天大楼林立、外资争相进入的地方，邓小平1992年南



这样，一定是历经训练、日积月累的结果吧。”周围的客人也都好奇地看着我们这边。

2001年摄制组造访邓小平故居。听说拍摄他晚年的镜头时，邓夫人和女儿提出了很细致的意见和要求，一直拍到她们满意为止。比如，邓小平“从来不穿白色袜子”啦，“走路的时候手心是朝后面的”啦，等等。听说饰演90岁的老人化妆很吃力，有一次化妆居然花掉了七个小时。

邓小平留给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1981年为了处理所谓“成套项目下马问题”，我随当时日本政府派遣的大来佐武郎顾问访华，受到邓小平接见时的情形。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想通过迅速引进成套项目来推动现代化，结果不久就遇到了严重的外汇不足的困难。日本企业接到的总额达数十亿美元的成套项目出口订单受到了影响。进入80年代后，这个问题不得不重新予以审视。

“合同能不能继续执行？”“就算下马，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考虑善后处理办法？”这些都是会谈的主要题目。我当时的经验还很浅，完全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才得以在这种重要的场合合作翻译。我强烈地感受到了邓小平身上那种溢于言表的领袖魄力和承担国政的责任感。邓小平对用不惯的译员很关照，说自己有一只耳朵背，请大点声音翻译。可是我不习惯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一点儿也听不懂。他与其他时候访华的日本首脑会谈时，我不是作翻译，而只是猫在一隅作记录。那个时候，旁边就有中国记者互相询问邓小平说了些什么，来确认他说过的词语和意思。连中国人都听不懂，我很惊讶，也感到了些许安慰

“改革开放的时代”现在依然在持续着。由于加入了WTO（世界贸易组织），这个改革开放的潮流已经不可逆转。“总设计师”如今还健在的话，一定会竖起大拇指说“好！”的吧。

三、改革的主角朱镕基

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开始，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25个年头。体制转换正式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核心人物就是1998年3月就任总理的朱镕基。在上任后不久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说：今后五年的任务就是“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即：确保1998年GDP增长率高于8%、通货膨胀率低于3%、人民币不贬值；三年左右国有大中型企业扭亏到位、中央银行强化职能和自主经营到位、国务院（中央政府）的机构改革（撤消11个部委、编制减少一半）到位；实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投资融资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此中无论哪一项都是重大改革。到五年后他离任时，许多已经兑现，或者正朝着这个方向推进。

现在，中国的经济改革正处在最艰难的市场经济机制形成的过程中。

我第一次见到朱镕基是1987年。那时我在驻北京的日本大使馆当秘书官，负责经济工作。有一次接到朱镕基要调上海任职的通知，就同上司一道去拜会送行。当时他还是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副主任。谈话的内容记不清了，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冷静、睿智、务实。